巡礼篇

世纪辉煌

创新的力量

天津日报

百岁新生·人文

中国最早的体育场之一——民园体育场。

五大道

历史剪影 时代华章

五大道包括马场道、成都道、重庆道、大理道、睦南道、常德道等22条马路，总长度17公里，总面积1.28平方公里。79岁高龄的五大道志愿讲解员张振东，当年曾参与开发五大道的旅游线路，他们在编写讲解词时总结了这样一句话："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看天津，天津缩影在和平，和平精华在五大道。"

1856年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，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，西方列强相继设立九国租界。五大道最初是英租界安静、舒适的住宅区，数以百计的清朝皇亲国戚、遗老遗少，北洋下野军阀政客，以及工商业巨子、洋行买办都来此买地建房寓居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这一区域出现了许多造型别致的小洋楼，构成了多元文化融合、建筑风格多样的独特风貌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闹中取静的五大道仍保持了特有的静谧气质，王光英、骆玉笙、马思聪、李霁野、梁斌、王苹等各界名流都曾居住于此。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，震后的五大道地区，私搭乱建了许多违章建筑，景观失色，风貌无存。1984年，天津市开展改善城市人民生活十项工作，其中之一就是重点整治五大道和解放北路区域的街景与市容。整修后的五大道，庭院整洁，树木葱茏，大理石圆柱、顶檐回廊装饰宛若新出，天津的小洋楼又变得亮丽起来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五大道规划为风貌建筑保护区，一些知名的餐厅、酒吧陆续开业。

2005年，天津市在国内首开先河，制定颁布《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》，为传承历史文脉立法。2013年，五大道与解放北路、中心花园、劝业场、一宫花园、古文化街被确认为首批风貌建筑保护区。五大道的保护性开发在"修旧如旧"的整体原则下不断推进，民园西里文化创意街区、新民园体育场、先农商旅区、庆王府等历史建筑，经过精心规划整修，增加了旅游休闲、文博展示、特色餐饮等功能，成为城市风情旅游的聚客锚地。

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、央视纪录频道和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9集人文纪录片《五大道》，播出后产生了较大影响，将五大道的知名度再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近年来，五大道焕发新生机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成立招商服务专班，从看楼选楼、办理手续到进驻装修，提供一楼一策专人服务，五大道将成为我市"文化价值最高、财富创造最多、经济效益最好"的区域之一。

周骥良每天坚持写作，为历史存档。

百岁周骥良

与党同龄 初心不改

6月上旬的一天上午，记者如约来到天津老作家周骥良的家中，7月1日就将迎来100岁生日的他，如往常一样，用完早点后端坐饭桌前，举着一个放大镜翻阅当日的报纸。访谈开始，有女儿在一旁做"传声筒"，周骥良靠着椅背神态自若。他的思维依然清晰敏捷、谈吐清楚有力，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，那些尘封在历史深处的人和事，重新被点燃被激活，在他的叙述下鲜活生动，如在眼前。读其文读其书读其人，有着76年党龄的周骥良，谈及一生的革命工作和写作生涯，始终无怨无悔，正应了屈原《离骚》中的那句诗——"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"。

人得有理想和信仰

1945年春，正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就读的24岁大学生周骥良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此之前，他耳闻目睹了西安事变、卢沟桥事变、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等历史事件，阅读了大量进步革命书籍和文学书籍，从一个单纯为了学业烦恼的中学生，逐渐成长为浸润马克思主义理论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进步青年。"为了躲避风险，我们那时在地下状态入党，没有入党仪式，上级联系人看一看申请书，让我们记住入党时间，就一把火烧掉，扔进簸箕里。"周骥良回忆道。入党成为周骥良和身边进步同学共同的追求。"国家要灭亡了，我们怎么办？""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国。""不参加共产党，参加什么？"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，周骥良和战友们当时的思虑和抉择，于当下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回响。"我们那时就是有信仰，认定了跟着党走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"这是周骥良的初心，一直到今天，他也坚定地认为："人得有理想和信仰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不能说现在的条件好了，就不用去追求和奋斗了。"

新中国成立前，周骥良冒着极大风险，从事地下党工作，发展了一大批新同志加入党组织，辅仁大学的同学、工作以后的同事、身边的亲友包括三个弟弟在内，都是他发展的目标对象。他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：出身东至周家——从第一代周馥，第二代周学熙、周学熹到第三代周叔弢、周仲铮，第四代良字辈，第五代启字辈——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、人才辈出的家族。借此家庭出身，发挥隐蔽战线难得的关系，这是党组织交给周骥良的任务，他不负重托，他的家几乎成了北平地下党学委的据点，多次举行地下重要会议。1948年冬，周骥良从上海奉令北归迎接平津两市的解放。在解放前夕的天津，周骥良和战友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——帮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转赴解放区、在大小企业中推动建立护厂队……他还打通家庭关系，接上了党与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联系的通道，他的伯父、民族资本家周叔弢与另一位民族资本家李烛尘留守天津，稳定住了天津工商界局面，和天津人民一起迎来了1949年1月15日这座城市的新生。

天津解放后，周骥良由地下转为地上，先后在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成员、《星报》副主编、市文化局电影科科长、市作协副秘书长等岗位上锤炼，其间，他拿起笔重新开始写作；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历任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、天津市民俗学会会长、天津市侨联作家艺术家联谊会主席等职务。无论何时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，他都始终勤勤恳恳，为党工作。

留住天津红色记忆

1987年离休后，写作成为周骥良的"主战场"。从长篇小说、长篇连载、报告文学到儿童文学、连环画、散文随笔，涉猎体裁之多、题材之广，令文坛为之瞩目，作家周骥良也被更多的读者所熟知。几十年来，他在报刊发表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，文笔精炼，佳作迭出。

周骥良说自己的写作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，先生所践行的文学"民族化、大众化、革命化"，给他以深刻启悟，这三个词也贯穿了他几十年来的创作生涯。而其内里，则是他对"文艺为谁"这个问题的深度思索和实践。在很多文章里，周骥良都表达了对红色革命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推崇。从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我们在地下作战》到80年代以来创作的《吉鸿昌》《杨虎城》《游击英雄包森》《勿忘国耻》等，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他一直追求的"具有民族化与大众化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"。

2018年，周骥良以97岁高龄出版了26万字的纪实文学《百年周家》一书，让人不禁惊叹于他的创造力。多年来，周骥良坚持阅读和写作，每天通过阅报了解时事和社会，上下午各保持两到三个小时的写作时间，这就是他一直以来能够笔耕不辍的重要原因吧。

人是时代的过客，也是环境的产物。周骥良生在天津，在天津迎接解放，又在天津执笔写作，他写得最多的是天津的人和天津的事。"只要有关天津的人和事，我能补充的就补充，能呼应的就呼应。"一直没有停笔的周骥良，新的写作计划已经付诸实施："今年是建党百年，我写的主要是红色题材文章，要把天津的红色记忆留住。""七一"前夕于《天津日报》副刊"满庭芳"开设的"百岁忆往"专栏里，周骥良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——在这些文章里，有他熟悉的昔日地下党战友的身影，有他担任报纸副主编时采访见证的优秀天津儿女的足迹，有他亲身经历和见证的解放前夕地下工作的风起云涌，更有他对初心和信仰的追寻回望……

百年人生，初心不改。在西青区大寺镇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内，周骥良在此已经生活了20多年。现在，他几乎不再下楼，但他的世界并未变得狭促。他还在写作，"为历史存档"。与党同龄，百岁周骥良仍在跋涉，不懈追求。

■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何玉新 刘云云
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吴迪